

杂忆越南

□范咏戈



“远亲不如近邻”，越南比其他近邻更“近”：其北部长期为中国领土，公元968年才脱离中国正式建国。有意思的是，连越南这个国名也源于中国嘉庆皇帝。直到1945年，汉字仍然是越南法定文字。越南抗法抗美的几十年里，中国给予的援助是无私的。后来，两国又相向而行走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越南称“革新开放”）之途。重翻20多年前即1995年11月应越南作家协会邀请访越的随记，河内、海防、广宁省下龙湾、岘港、顺化、头顿、胡志明市等地记忆被重拾。权作杂忆，乞和读者一起对这个近邻国家获得些许感性认识。

河内大排档和“我要发”

90年代北京尚无直达河内的民航航班。由北京去河内或经由香港，或经由南宁。为节省国际旅费，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线。飞机早上8点半由首都机场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的飞行，中午12点到达南宁。继续飞往越南的乘客需下飞机后在南宁海关办理出关手续。在海关花了1个多小时办完卫生检疫、安全检查、边防检查等，下午1点多飞机又重新起飞。从南宁新上的乘客大都是越南人，飞机继续飞行40多分钟后便降落在河内机场，没想到河内是这样近。机场不大，从停机坪到候机厅也没有封闭式通道，需坐大巴进候机厅。一出机舱便感到一阵热浪扑面而来，毕竟是南国，虽是深秋，这里的气温仍在28℃。

来到河内的第一天，由于在机场找行李耽误了时间，待我们一行坐上越南作协前来迎接的面包车时，已是下午3点了。主人和客人都还没吃午饭。征求我们的意见后，在去宾馆的路上，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进了一家路边店，我们也很想体验一下河内的大排档。这种路边店环境的确一般，长条木桌，矮木方凳，桌上放着公用酱醋、辣椒瓶，每人一双一次性卫生筷子和几张餐巾纸。我留心看去，都是中国广西出的。我们每人要了一碗越南米粉，有点像云南米线，倒是实实在在一碗，上面还卧了一个鸡蛋。出国能吃到接近中国口味的热餐就知足了。主人怕我们不够，又要了一些油条。河内的油条既短且硬，远不如我们的油条酥脆。饭后我问了一下，这顿饭每人大概合人民币4元左右，物价不算高。

吃了河内的大排档，晚上即被主人邀去河内郊区一家有名的个体蛇餐馆吃蛇。以蛇宴作为第一次正式宴请，可见吃蛇当属上等佳肴、河内大菜了。主人先带我们参观养蛇的地方。这是一个几米深的大池子，客人们在高处凭栏而望，下面几百条蛇翘首踊跃，据说每天要售出一两百条。餐馆老板亲自给我们作杀蛇表演。只见他拎起一条1米多长、手腕粗的毒蛇，抓住蛇的颈部，一个帮手往蛇的嘴里灌了一杯酒，先把蛇给灌醉，防它咬人。接着他持刀从蛇的颈部一划到底，蛇就被剖成两半，然后接血，取心、取胆，分别放进几个碗里。如此一会儿就杀了数条蛇。客人入席，斟酒。老板把跳动着的蛇心放在两个碗里，分别捧给越南作协副主席有请和我们代表团的陈建功团长。有请向建功敬酒，说必须喝下此酒，我们的心才跳在了一起。我们几个都是北方人，吃蛇是外行，唯建功祖籍广西颇有勇气，一口饮干，顿时一片喝彩，其余每人一杯蛇血酒也只有闭着眼睛喝下。这次蛇宴叫作“一蛇十吃”。除了蛇心、蛇血，蛇胆的吃法比较独特。他们是把蛇胆焙干，然后教我们蘸着椒盐面吃，同时让我们吃一种类似鱼腥草的野菜，说是有解毒之功。至于蛇肉，则或炸、或烩、或蒸、或煮，河内的菜与广西菜更为接近。

河内高楼大厦不多，多的是三四层建筑物。商店门面比较陈旧，交通工具以摩托车和自行车为主，沿街有不少竣工和未竣工的私人住宅。据说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的国策以来，由于允许从事第二职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老百姓生活已有了很大改善，手头都有些钱。大家的目标已由买摩托车、家电进入到盖私人住宅的档次。这有点出乎我们的估计。也许正是这些拔地而起的小楼，显示出河内是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

在河内，我们住在“红玫瑰”宾馆。这是一座五层楼的法式建筑物，内部设施相当于国内的三星级宾馆。开始令我们不解的是，我们五人被分别安排在三个楼层中，后来才明白为什么没有集中住在一层，是因为主人想分别让我们住带有“18”的房间，因此我们

的房号分别是218,418,518。没想到到了这里，也很讲究“要发”。

巴亭广场玉山祠

河内最大的广场巴亭广场相当于半个天安门广场，与莫斯科红场的大小差不多。与它们不同的是，巴亭广场更像个大草坪。几条交叉的石子路把广场切分成若干绿的方块，与周围黄的建筑、猎猎飘扬的红旗相映成趣，整洁中显出庄严。这里显然是河内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社会主义越南的国父胡志明主席的陵墓坐落在巴亭广场中心位置。胡主席陵墓于1973年动工，1975年落成，全部由灰黑色花岗岩砌成。胡主席穿卡其布干部装装殓，胡志明墓建在列宁墓之后、毛主席纪念馆之前，其建筑风格下半部是列宁墓的样子，上半部具有毛主席纪念馆东方建筑的飞檐斗拱，远望如一朵莲花，从中也可窥见中越文化接近之一斑。

离开巴亭广场去了市内名胜“玉山祠”。玉山祠是越南陈朝(1225-1400)时期的建筑物。越南在9世纪末摆脱中国封建政权的统治立国，至13世纪末本国文字“字喃”发明前，都一直使用汉字。所以祠内各种碑文、题诗等大都可以看懂。无论是三关门“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的楹联，还是还剑湖面镇波亭上19世纪越南名儒阮文超“剑有余灵光若水，文从大块寿如山”的题诗，都使人感到两国文化难以置信的接近。随后观看园正在表演的越南“水上木偶”。首先剧场就颇为独特：观众面前的舞台是个水池，水池后面是一块红色大幕，演员幕后操纵木偶在水面上表演。有二龙戏珠、蛙人上树、孔雀开屏、水牛抵角、渔翁垂钓等，内容大都和越南的农事有关。观后我以明清学者王夫之著名的《卜算子·咏傀儡》词赠之：“红烛影摇风，斜映朦胧月。铅华谁辨假中真，皮下无些血。”玉山祠所处的还剑湖是河内市区著名风景区。湖面有北京的北海大小，越美战争期间，这个美丽的湖也被“B-52”投下了炸弹。河内人都知道，至今湖心还留有一颗炸弹。我想这颗炸弹一定是经过处理、专供人们留下记忆用的。在此后访问越南的其他城市时，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战争在越南人民心中那永远难以抹去的印记。

顺化故都种种

访问过河内后，经由岘港去顺化。越南国内航空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我们乘坐的是法国航空公司和越南航空公司合营的飞机，机组人员是法国人，空姐是越南姑娘。飞机比较平稳，也比较准时，7点起飞，8点10分就到达岘港机场。岘港是越美战争时期有名的军港，现在是一个对外开放的风景区。这座海滨城市美丽、整洁，各国游客如织。下飞机后，在越南《文艺报》驻广宁代表团下，先参观著名的占婆博物馆，然后在海滨的水上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即改乘汽车沿盘山公路回头北上去顺化市。

顺化市是越南的中部城市，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都城，现在是承天顺化省省会。顺化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越南文化的摇篮，该市有保存完整的阮朝建筑300多处。我们被安排住在省委交际处。这是一幢苏式建筑，每个房间都很高大宽敞，给我的钥匙上面还印有俄文，而房内的茶具则是中国江西的产品。我们在顺化故都遗迹保护中心研究人员小潘的带领下冒着倾盆大雨参观顺化的故宫。顺化故宫和中国故宫在建筑格局上十分相似。越南最有作为的皇帝是阮朝的明命皇帝，据讲明命皇帝为防宫内争斗不确定皇后，无数皇妃共为他生下142个子女。

明命皇帝从1820年到1840年共在位20年。在他统治时期，越南的版图最大。他本人会吟诗作文，有点像中国的乾隆帝。据小潘介绍，目前在越南还有2000多名皇族成员。越南的名酒就叫“明命汤”，是一种滋补酒，据说是明命皇帝喝的御酒，其味道有点像洋酒。它是否代表越南酒文化，不得而知。但说顺化的服饰代表了越南服饰文化则是事实，这就是越南少女穿的白色长裙。苗条的身材在白裙下若隐若现，再配上乌黑的披肩发，充分展现出南国少女迷人的风韵。越南其他地方也有白裙，但据说只有顺化做得最为地道。

顺化市文联把招待中国作家的晚宴安排在香江上的一艘游船上。船在香江上漂，我

们在舱内席地而坐，一边喝着明命汤，一边听6位男女民间艺术家为我们弹唱顺化民谣。其中一位78岁的老者，据说是前皇帝的乐师，也是越南文化部授予的优秀艺术家。3位女演员唱的民谣大致意思是：晚上去找情人，尽管是天黑，摔了好几次跤，还是过了江。从舱外望出去，江上渔火点点，使我想起清人蒋士铨咏我的家乡济南大明湖的著名诗句：“画船游，明月路。古历亭虚，面面朱栏护。百顷明湖三万户，如此良宵，一点渔灯度。”此情此景，多有相像。主人们边唱边教我们往江面上“放纸灯”。能歌善舞的顺化市文联副主席告诉我们，香江放灯是佛教的一种仪式，表示朋友分别了还会再见。几位姑娘给我们折了一些纸船，每只船上有一支点燃的蜡烛，把纸船从船的窗户放到江面上去。不一会儿，船周围已经是点点星火，随着江水越漂越远，甚有情调。此时，艺术家们合奏起《流水与金钱》，把客人带入一种故都文化特有的境界。

顺化市宁静、清新、美丽。据顺化的省委书记介绍说，顺化的现代化建设不如胡志明市快。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去美国在这个抗美援朝如火如荼的地区投资少（我询问顺化的朋友，得知著名的抗美勇士阮文追烈士就是顺化人，其妻现在是一个饭店的经理）；二是因为是故都，出于保护古城的考虑，严格控制现代化建筑。如本来有省际际处对面搞一个合资水泥厂，后来取消了。顺化也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越美战争期间，美国人在顺化投下的炸弹等于朝鲜战争的5倍。在长山脉施放了1340次化学毒药，一直到1968年，美国人还用飞机和火箭来轰炸古城墙。今日之顺化，可以说是“苦竹编篱茅覆瓦，海田久废重耕。相逢犹说廿年兵”。

胡志明市

离开顺化，飞往胡志明市。胡志明市是美伪统治时期的南越首都，现在是越南中央直辖市。由于当年美国投资进行了一些市政建设，所以城市比较漂亮和繁华。胡志明市在“革新开放”以后，外国投资者纷纷涌来，主要街道上到处矗立着国外大公司的广告。越南主人首先安排我们去距胡志明市百公里的越南最南的头顿省参观了头顿海上石油基地。这是越南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也是越南一个合资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午，主人招待我们在海滨海度假村吃海鲜。餐厅修成有12只角的越老柬一带的“寮”，有一种原始古朴风味。

到胡志明市，自然要去参观伪总统府，美伪时期的总统府已改名为统一宫。据介绍，这座五层的建筑始建于1869年2月，是法国殖民者在西贡的印度支那总督府。当时这座建筑占地12万多平方米，3年的时间才建成。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订以后，法国人被迫离开了越南，这座建筑物交给西贡当局吴庭艳政权。1975年原属于西贡军队的两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总统府投降，使之倒塌了一部分，现在的建筑物是倒塌后重建的。统一宫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楼顶有一个供直升机升降的阳台。统一宫内有许多房间，如：庆节室、内阁委员会会议室、总统办公室、副总统办公室、大宴会厅等百余间，实用总面积2万平方米。1975年4月30日上午10点半越南国旗飘扬在楼顶上空，宣告了旧制度的灭亡。根据越南国会的决定，从1975年11月起把这座建筑更名为统一宫。

早在从岘港沿长山脉公路去顺化的路上，也就是经由越美战争时期进行过激烈“丛林战”的战区、后来又成了美国拍越战片的外景地时，汽车一边在类似“青纱帐”的热带丛林中穿行，我们则一边与越南作家讨论起对美国拍的越战影片的看法。在胡志明市，我们又在这统一宫参观了南方战士纪念馆。因此，在与胡志明市作家交谈时，这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通过讨论，我们对越美战争及由此而来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美国的越战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59年7月8日夜，6名在南越的美军顾问团士兵到西贡近郊边和的军营看电影。电影刚刚开始，屋里的灯突然亮了起来，顿时枪声大作，两名美国士兵当场毙命。从此便拉开了十几年中成千上万美国人毙命越南沙场的序幕。

尽管美国人期望早日忘却越战，但它造成的社会影响肯定会长久持续下去。美国的电影人看到了这一点，从1968年开始，他们就一步步把这一敏感题材搬上银幕。先是由一些小制片公司参与，到80年代末，终于为好莱坞所青睐而蔚成壮观。越战片大体反映了美国人卷入这场战争的无奈和必然失败。如《全金属外壳》《现代启示录》《野战排》等都把观众带回到噩梦般的越战中去。美国人面对隐藏在丛林中的游击高手，虽一个个倒地而亡，却不知子弹从何而来。《猎鹿人》把美国的3个蓝领工人在越南胡作非为的经历，以及他们最终为这场战争所拖垮表现了出来。其中两个十分紧张的“俄罗斯轮盘赌”的场面，实际是暗喻战争的盲目和可怕。据越南朋友说，他们看了这些影片，当然不能同意其中对越南人民的有意丑化和歪曲，但美国的电影艺术家能够认真反思这场战争给美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相信，将来越南的艺术家一定会拍出自己的越战片来。越南作家协会外事处处长是位诗人，访问过美国，也曾在越南接待过《现代启示录》的导演。据他讲，这位导演在胡志明市看了当年越战的一些真实记录和战争遗迹后，对自己在影片中丑化越共游击队表示了歉意。



李济生

那天中午，我从周立民老师处得知济生先生于2022年12月30日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105岁。我和先生相识已有12年，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为人热情、性格豪爽。而且我们还是四川老乡，我很喜欢他那口好听的川普。

在我的征集工作中，我曾三次有幸拜访济生先生。

第一次拜访济生先生是在2010年。那年2月，我陪着老领导刘屏主任特地前往济生先生位于上海打浦路家中拜访。那天我们到得有些早，恰好济生先生出去买菜，我们在客厅等待。济生先生的客厅陈设很简单：一对老式沙发，几个旧式书橱，书橱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巴金先生有关的。客厅中贴着的一幅著名书法家赖少其先生的墨宝让我印象深刻，我当时很认真地看了这幅书法。赖少其先生的书法有着浓郁的金石味道，常给人一种削拔苍糙之感。作为一代书法名家，赖老先生的作品在中国的书画市场早已是洛阳纸贵。可济生老先生将这幅书法作品托裱后，直接就“糊”在了墙上，既没做成轴，也没装镜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作家这样“原汁原味”地用书法装饰客厅。济生先生的这份随性与洒脱，可真不一般。

当我正与刘屏主任低声商谈这幅书法时，门开了，济生先生买菜归来。他跟刘屏老师是老相识，一见面，济生先生便用他那浓浓的川普欢迎远道而来的老友。刘屏老师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李老，好久没见了。您身体还是那样好！”

济生先生笑着说：“马马虎虎。这位同志怎么称呼？”

刘主任赶忙将我介绍给济生先生：“李老，这是我们文学馆的小慕，跟我一起做征集工作，是文学馆的青年军。他也是四川人，和您老乡。”

我走上前，向济生先生伸手致意，“李老，您好！我是四川西充人。”

“你好，小老乡。我是成都的。”济生先生用地道四川话回答我。

济生先生个头不高，虽已90多岁，但精神矍铄，声音底气很足，身体很硬朗。济生先生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因为小沙发只有两个，我便搬了把椅子坐在旁边。刚一落座，主任便跟济生先生聊起天来：“李老，我们这次来上海拜访您，一是来看望您这位文学馆的老朋友，二来也是希望您能继续征集您的珍贵资料，丰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

济生先生听后笑着说道：“巴老创办文学馆的初衷，就是要尽可能地收集作家资料，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一个集中保管、展示、研究的地方。这几年，我虽在上海，但一直很关注文学馆的新闻。文学馆在搬入新馆后，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征集了许多作家资料，举办了很多家活动，工作很有效。我自己的这些资料，以后会考虑放一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你们的工作我会大力支持的。”

在交谈中，刘屏主任也向济生先生谈到这幅装饰很有“特色”的书法。济生先生微微地笑了笑，说这是有一次赖少其先生来上海时给自己写的。自己对书法不是太懂，后来只是简单托裱了一下，就贴在客厅“装饰门面”。对这些字画，自己从来都不是很在意，也不愿花费很多精力，觉得这样简单装饰也不错。

当时我很认真地跟济生先生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用镜框装饰一下？因为这样对书法是一种保护。南方天气很潮，尤其是冬天，直接贴在墙上，对宣纸易造成伤害。有镜框就会好很多，而且

我记忆中的济生先生

□慕津锋

看上去效果也不错。济生先生笑着点头，“这个建议，值得注意。只是我岁数大了，弄这些还真有些费劲。有机会，我会考虑此建议。”看得出来，济生先生是一位生性散淡，只求淡泊朴实生活的老人。他所追求的可能就是那种“风来疏竹，风去而竹不留声；雁照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的人生。

第二次见济生先生，是在2015年夏天。那时他已经因身体原因开始住院。那天上午，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徐汇区中心医院。济生先生住的是一个两人间的病房，病房采光很好，很干净。当我走进病房时，济生先生还在床上睡觉。较之5年前，他看上去明显老了一些。我与陪护他的女儿李国焯老师是初见，当我轻声与她交谈询问济生先生近况时，济生先生醒了。他看了我一眼，但没有认出我是谁。国焯老师俯下身在他耳边大声地说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小慕来看你了，他说几年前和刘屏到家里看过你。现在刘屏退休了，主要是小慕在做征集工作。”

济生先生听后，笑着向我挥手示意。我走到床边，握着他的手，“李老，您好！我是小慕，刘屏主任的部下，我曾去过您家里。这次来上海，我才知道您住院了，很不好意思，我的工作没做好，您现在身体怎样？”

济生先生用他那浓浓的川普回答我：“人老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病，没什么大事，你还好吧？文学馆的同志们还好吧？刘屏都退休了？”

“是的，刘屏主任2013年退休的。前几天，我在单位还看见老主任，我跟他提起我要到上海出差。刘屏主任叮嘱我一定要来看看您，让我见到您时，代他向您表示问候。”

“谢谢！你回去之后，请代我谢谢刘屏。他都退休了，时间真快！当年可还都是小伙子呢。”济生先生笑着说。

“李老，您放心！我一定将您的话带到。我这次来，刘屏主任还嘱咐我希望您能继续大力支持文学馆工作。虽然他已退休了，但主任希望‘征集’这项事业后面的人要继续做下去。我说我一定会努力做好。文学馆非常希望能征集到您的珍贵资料，您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编辑家，您为中国的文学出版做出了积极贡献，文学馆很想收藏您的资料。”

济生先生听后，连连摆手，谦虚地说：“我只是个普通编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所说的事情，我会认真考虑，等我以后身体好些了，我会为文学馆准备些资料。”

那次，怕耽误大长时间影响济生先生休息，我与国焯老师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便与他匆匆握手告别。

第三次拜访济生先生，是在2017年8月。当我再次走进那间熟悉的病房时，国焯老师正坐在床边，济生先生正躺在床上看报纸，看上去精神很不错。国焯老师看我进来，起身热情地招呼我。济生先生微笑地向我招手，我走到床边，双手握着他的手轻声问候道：“李老，您好！又有一年没来看望您了，这次来，您精神很好啊！”

“马马虎虎吧，上海这么热的天，你还从北京过来。辛苦啦！”

“不辛苦。”我告诉济生先生，刚才我去华东师大看过钱谷融老师，钱老让我问候他，大家都要多注意身体。

“谢谢谷融，我们很久没见了，他还好吧？”济生先生望着我问道。

“钱老还不错，就是瘦了些，精神状态很好。他很挂念你们这些老朋友，说现在老朋友都岁数大了，很少见面，电话也少打了。”

“人老了，是这样的。”济生先生微微地笑了笑。

随后，我跟济生先生聊起前不久我回川拜访马老（识途）、王火等老先生的情况。济生先生很关心马老的近况，当我向济生先生讲到这位四川老友身体很好，而且还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作时，他很高兴。听我讲起这几年成都的变化，济生先生轻声地说道：“很久没有回四川了，上次回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看得出来，济生先生对四川的那份思念之情是那样浓，但对已至百岁的他，再回故乡，谈何容易。不说老人，就是我，如果不是出差，几年我也很难回一趟家乡。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济生先生。



山河图
赖少其作